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丛书



张学良

暨东北军将领传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 编



华文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丛书

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

华文出版社

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
中国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府右街力学胡同3号
沈阳市新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8 字数：245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责任编辑：王维凡 王文祥 责任校对：张德良
封面设计：刘桂湘

ISBN 7-5075-0245-7/Z·95

定价：9.00元

主 编

周 毅
常景兴
郭 君
赵双城

连 军
高景生
张友坤

前 言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的主要任务，是向读者推出作为在中国现代史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东北军将领们的一组群像。以人物传记的形式集中而生动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岁月和人生道路，反映东北军所走过的曲折复杂而又悲壮的历程。

本书实为东北军将领传之第一卷，首选 28 名东北军将领。他们分别是：

一、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东北军的性质与作用，是和它的统帅张学良的思想演变、性格、行为直接相关的。传记中的张学良将军，作者是以张学良自身言行为基础，对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生涯，给与了系统全面的评价：由军阀的大公子转向青年爱国者；由军阀转向爱国将领；第一次国奉合作的襄助者；第二次国奉合作的首倡者和实行者；东北军内部恶势力的洗刷者；反共容共兼蓄并包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新军阀混战的制止者；中日合作的构想者转变为日本侵华的反抗者；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由对日不抵抗命令的执行人转变为局部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与指挥者；由豫鄂皖、西北“剿共”战争的参与者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联共抗日、联蒋抗日的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长期幽禁，不改初衷。本书张学良小传重现了他作为东北军统帅叱咤风云多姿多彩而又曲折复杂的行程，对其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说。

二、东北军各军的军长。如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吴克仁、王树常、冯占海、刘多荃、王铁汉等人。

三、东北军各军、兵种代表人物，如炮兵邹作华，海军沈鸿烈、空军高志航等人。

四、在东北军十四年抗日战争史和西安事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抗日英雄、抗日名将。如马占山、黄显声、赵毅、冯占海、李杜、苏炳文、高福源、常恩多等人。

五、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如王以哲、吴克仁、刘桂五、方叔洪、扈先梅、王鹏举等人。

本书传主是以张学良为首，其他各将领则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东北军的前身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军。张作霖不仅是“东北王”，“满蒙王”，而且还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中央政府的末代元首。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实现了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的最后覆灭和东北军的正式诞生。东北军名义上编入国民党军队统一序列，但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属于地方实力派，“九一八”事变后变成了抗日爱国的东北流亡武装集团。它在六年局部抗日战争、“一二九”运动及西安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十四年抗战中，东北军贯彻了张学良复兴民族、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初衷，转战各地，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与牺牲。当然在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东北军不断的分化与分裂，这在东北军的将领身上自然也有反映。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在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反法西斯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以及总结二十世纪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广阔视野上，来观察研究张学良和他的将领们，将更富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本书作者多为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且对张学良及东北军史有较深造诣的历史工作者，还有熟习情况的原东北军老战士。著者和编者希冀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向原东北军将士和后裔，以及

广大读者奉献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东北军将领的照片系由郭君提供，但有的照片模糊不清，有的照片未着东北军军装，皆因一时无法搜集到合适照片；恳请持有东北军军装之传主照片提供给我们，则无任感谢。由于编撰东北军诸将领的传记工作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海内外更多的研究者和知情者共同努力才能圆满完成。因此，借本书首卷出版的机会，我们代为转达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的热忱吁请：欢迎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同仁，为《东北军将领传》的完竣，携手共作。同时我们也欢迎对首卷的不足之处，不吝赐教。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的理事们，特别是会长张德良教授，给予大力支持与指导。全书完稿后，张德良、白竟凡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修改意见。本会副会长王维凡副教授以及华文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问世竭诚尽力，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周 毅 连 军 常景兴 高景生 郭 君 张友坤

谨志

1990年7月于沈阳

目 录

张学良(1901—)	张德良 周 毅 连 军 常景兴(1)
于学忠(1890—1964)	郭维城(52)
万福麟(1880—1951)	袁亚非(78)
马占山(1885—1950)	田 禾(91)
王以哲(1896—1937)	王 秦(107)
王铁汉(1905—)	许晓敏(127)
王树常(1885—1960)	陈志新(136)
王理寰(1895—1985)	高景生 孟繁宗(149)
王鹏举(1898—1937)	王西萍 刘培植 于维哲(160)
方叔洪(1906—1938)	尚 言(163)
白凤翔(1897—1942)	李 敏(165)
冯占海(1898—1963)	董惠云(175)
刘多荃(1899—1985)	晓 流(186)
刘桂五(1902—1938)	晓 流(192)
吴克仁(1894—1937)	魏 普(199)
李 杜(1880—1956)	王希亮(211)
何柱国(1897—1985)	郭 君(228)
邹作华(1894—1973)	刘启奎 高景生(239)
苏炳文(1892—1975)	王希亮(245)
沈鸿烈(1882—1969)	孟繁宗 高景生(257)
赵 毅(1898—1967)	白竟凡(268)
高志航(1908—1937)	茅海建(281)

高福源(1901—1937).....	张友坤(286)
扈先梅(1896—1938).....	凡人(293)
常恩多(1895—1942).....	刘祖荫(295)
黄显声(1896—1949).....	周平生(308)
董英斌(1894—1960).....	乔庭顺(334)
霍守义(1898—1967).....	刘祖荫 霍正实(345)

张学良

(1901~)



一、由军阀大公子转向青年爱国者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①辽宁省海城县人。出生在大车上，养育于广宁县桑林子镇詹家窝棚（广宁县后改为北镇县，1913年增设台安县，今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

棚屯）。乳名双喜，后改为小六子。字汉卿，别号毅庵，化名李毅。奉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之长子。童年并不富裕，花一块银元雇个40余岁的奶妈，没多少奶，靠嚼高粱米饭布子喂大。新年还要借新衣服穿。及长，随着张作霖的发迹，家世显赫起来，才被时人称为两大公子（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四大公子（外加段祺瑞之子段鸿烈，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或五大公子（再加张謇之子张孝若）。

少年时代，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六七岁时父张作霖特聘台安举人崔骏声为其开蒙。十三四岁从师金梁学文。1915年随父进入奉天，在家设专馆，聘海城老儒杨景镇和奉天省议会议长、国立

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白永贞任教，为张学良奠定了文史知识基础。英文指导教师由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和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担任。德文教师由东三省军事测量局局长陈英担任。此外，还学习过法文。能用法语会话。英德法文的学习，与外国人的交往，给张学良打下了的外语和外域知识的坚实基础。张学良虽然是个顽皮少年，但聪颖过人，接受教育很快。他所受的教育及影响主要是封建儒家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但受西方师友的影响较之受本国师友的影响更深。加之眼见身受日俄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促成了张学良反帝爱国思想的萌发。

学生时代的张学良 1915 年步入社会，在奉天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运动。张学良说：“及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²⁾爱国储蓄运动是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组成部分。张学良先是于 1915 年发起成立奉天救国储金会，并经手募集了一批股款。以其范围狭小而停止，又于 1917 年与友人共同发起奉天储蓄接济会。其宗旨为接济贫民，惠及商民，从事生利事业，以免除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张学良还在 1916 年，走上街头，参加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身为大公子的张学良为救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衣玄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³⁾

张学良到奉天后，先是参加摩登俱乐部所属网球俱乐部，全是外国人，他是唯一的中国人。1916 年他又参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会董。从此他开始了与西方人的交往。他多次谈到青年会在他成长中的意义。他说：“鄙人幼年教育之扶持，多赖青年会。”又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到青年会之助力。”同年 11 月，年仅 16 岁的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听了时任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来奉天的讲演，竟使他终生难忘，给张学良思想的成长打上极深的烙印，并称张伯苓是他的老

师，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日后他常常忆起这段往事。1930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中说：“予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国。’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①张学良以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以聆听张伯苓讲演为转折点，坚定地树立起了“立誓救中国”的人生观，即以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人生观。

张学良首次访日是1921年秋赴日本观秋操。张学良访日期间虽受优待，但对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日本总想以势压人，炫耀武力，张学良不但没有害怕，反倒引起反感，他是一个有反抗性的人。归国途中，陪同前往的张作霖日本顾问本庄繁问张学良：“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来反日最力呢？”张学良回答说：“就是因为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张学良从中领悟出一条真理：日本人这种优越感，实为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访日归来他提议奉军应实行军事现代化，为其父张作霖所采纳。

1923年爆发了全国人民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张学良同情学生运动，对北京学生和市民‘打倒军阀’、‘收回旅大’运动，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公开支持。他拿出自己工薪一百圆捐赠给“三·二”惨案受伤学生做医药费，还写了一封慰问信登在报上。信中说：“各国军警对于学生们的示威运动，只有在旁维持秩序，没有听说军警和学生冲突的。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国家外患的责任，但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施加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的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

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不能使国民得永久的安宁。”“我曾经因此告诫我的部属希望他们以后不致效尤。”⁽⁵⁾这封信把拥护学生爱国爱民反对军阀扰民害民的思想表述得极为明白透彻。也许这就是张学良从未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的原因。

1925年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时任军长的张学良对待英日帝国主义军警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如同对待“三·二”惨案一样，捐助自己工薪2000元，抚恤上海死伤的学生，并发出致全国学生会的慰问电。6月10日奉命率奉军教导队赴上海，其任务是调查“五卅”惨案真相，派兵保护中国居民，维持秩序，校阅军队。同日，亲往上海各医院慰问受伤之工人、学生21人，赠每人医药费50元。同时允许参加五卅运动的学生代表赴张学良军中讲演，以亲见亲闻激发军人爱国之心。更值得称颂的是他在上海接见华侨学生会代表时说：“至带兵一事，因在津闻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⁶⁾可见，张学良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的英雄气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张学良从十五六岁步入社会起，从思想到行动，俱已开始由军阀的大公子向着青年爱国者的途程转换着。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他从这个时期起，就是一个“爱国狂”。炽烈的纯真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成了张学良人生的主旋律，并为此矢志不渝。

二、由军阀转向爱国将领

张学良原本志愿学医，可是奉父命于1919年5月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扎下了军事学的根基，且名列前

茅，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跻身于奉系军阀行列。张学良幽默地说：我本来想学医救人，没学成，却学军学会了杀人。1919年12月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团长，1920年6月升任该军旅长，亦称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同年11月授陆军少将衔，1925年4月授陆军中将衔。1925年10月升任镇威军第三军团军团长，1926年6月再升为安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1927年6月授陆军上将衔。时人称之为“青年将军”。他还兼任海空军要职，1922年9月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1925年8月兼东北航空处飞鹏队队长，1928年7月任东北海军总司令，1930年3月任东北航空司令。其间他参加了军阀混战，即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与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同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之战，此间，他还参加1920年秋的吉林剿匪战争，1925年末的平定郭松龄倒戈战争，1926年8月同国民军冯玉祥的南口之战。1927年春对吴佩孚的豫军及对抗北伐军的河南战役。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按照对立统一及其矛盾转化规律向前发展着，富有传奇意味的是张学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去。他从身任奉系军阀高级指挥官参加内战之时起，就开始萌生了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力主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无数次的向人表白过这个心迹，直至垂泪规劝他的父亲张作霖，致书倾述给他的弟弟张学铭，并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许诺。当然，张学良参加内战是奉父命的违心之举，兼之他参政并未主政，因此，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他一方面参加军阀混战，一方面在谋求和平统一祖国之路，两方面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据他自己讲：“从19岁开始就玩谈谈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出什么呢？”⁽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当奉败直胜大局初定之时，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奉军三、八旅，在6月8日至13日的山海关之战，打退了直军追击，

守住了山海关大门，促成了直奉和谈，张学良成了和谈代表。在英国传教士杨古·德康脱尔和美国传教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平主义者普赖德为居间人停战建议下，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19日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一部驻防山海关外，大部撤回原防。山海关之战，继吉林剿匪之后，再次显示了张学良的军事指挥才能，秦皇岛谈判的成功，在张学良和平统一祖国的征程上，可算是首开记录。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张学良在九门口、石门寨之战再次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第二次直奉战后，奉军达到了鼎盛时期，占踞奉、吉、黑、热、直、豫、鲁、苏、皖9省，部分地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奉军人数亦上升至35万人之众。然而恰在奉军以胜利之师，声威大振之时，张学良反对内战思想，非但未曾改变且益形浓烈。1924年12月初，他对北京大学师生们说：“国人向痛诟军阀黷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此时并非怯于对外，实际上实不得不慎重考虑。学良军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⁸⁾他公开表示自己“决不愿为军阀”。⁽⁹⁾

郭松龄倒戈事件即使平定之后，他仍谓：“惟自军兴以来，四民杂徙，百业零，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渠”。⁽¹⁰⁾他看到的还是内战带来的灾难。南口战役大获全胜，但他反对为内战庆功祝捷。他说：“惟弟窃以兵乱之后，灾民遍野，南口一带，村落为墟。嗷嗷哀鸿，穷所无告。战士暴骨，饿殍载途。哀且不堪，何敢言庆。况此次战役，不过因政见不同，不得已趋于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¹¹⁾

张学良对1927年出师河南对抗北伐军之役感慨尤深。他说：

“予从前服从先严命令，数次打仗，皆为不得已之行动。予至京汉路上，见逃难之灾民，偶问之，十有其九，皆受兵灾之影响。而东三省为兵所耗，不下万万，若以办理建设事宜，岂可限量。奉军三次入关最盛时，曾达及江南，然而效果何在？予纵观古今，未见可以全用兵力谋建设者。”⁽¹²⁾他又说：“余以为中国目前所最需要者莫过于和平。余于19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于战争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余曾因战事至马牧集（今河南虞城），下车后，至附近加以视察，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面黄肌瘦，呻吟憔悴，痛苦不堪言状。姑询之，则均谓家中壮丁均被拉夫，田产房舍又被军队占领，于是余之内心即感觉万分痛苦。盖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者，全因军人之压迫，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者，又因战事之发生，故内战为罪恶之母。于是，余之人生观即从此改变。且作战不择手段，不论方法，只以争得最后胜利为目的，故作战时只知破坏，专事残杀，受害者人民而已。在作战之将士莫不以抛头颅溅热血为无上之光荣，殊不知男儿不协力对外，为国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其实内争之肇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¹³⁾这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张学良对自己8年戎马生涯和奉系军阀3次入关逐鹿中原，以及民国近20年来中国内战的总清算。在此基础上，他已把痛恶军阀，痛恶内战，实现和平，从事建设，定为自己的“人生观”，且认定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项志愿。他不仅有言论，也有行动。在第二次直奉战中他是第一次国奉合作的襄助者，在对抗北伐军作战前线，他锐意实行社会改革，“首倡弭兵”，谋求第二次国奉合作。

如果说，1915年至1916年，张学良从十五六岁步入社会起，参加反日爱国运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从思想到行动，由一个军阀大公子开始向着青年爱国者转变的话，那么我们还可说，1920年，张学良从20岁，出任旅长，参加实地战争起，从思